

逢振鐸

著

東夷古國史論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

22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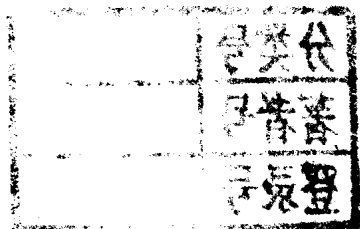
56

东夷古国史论

逢振镐 著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

1989年·成都



1998. 6. 15

编者赠阅

东夷古国史论

逢振镐著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邹平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2.8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册

中国标准书号 I S B N 7—81016—138—5/K·1

(11452·1)

定价：6元

东夷及其历史地位

《东夷古国史论》序言

唐嘉弘

(一)

逢振镐同志对于东夷古国历史的研究，十分勤奋，从东夷的史前文化到秦楚和齐国的关系，从中朝日之间古地理与《山海经》的古传说，从齐国的富民强国之路到齐鲁两国建国方针的比较研究，从孔子的评价到名医扁鹊，从出土文物到山东文化所受楚文化的影响等许多问题，都努力的进行探索，提出了不少新颖可喜的论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颇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现在，将有关文章结集，订名为《东夷古国史论》，确属可以祝贺的史林嘉事，无论对历史学或考古学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将会起到有益的作用。

鉴于东夷及其历史地位的重要，建国后日益受到学术界和社会上广泛的关注。王献唐、李白凤二先生均作出了斐然可观的有价值的成果。近年来由于田野考古工作的欣欣向荣，新出许多重要遗址和墓葬，对探索东夷历史之谜提供了不少十分有价值的资料，从而推动了东夷历史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

面临一个一个考古文化遗存的不断出现，人们往往将远古“帝王”、氏族部落和它比拟，甚至将其某某文化订为黄帝文化，某某文化订为尧舜遗迹，某某遗存订为少昊文化，如此等

等，我总觉得这类作法不大具有说服力，稍嫌武断。历史科学“无征不信”，应当重视人证物证，黄帝、少昊、尧、舜等远古部落首领的真实历史尚在争论之中，他们的活动地区、生存时代、祖先源流等歧说并存，莫衷一是，冒然的将某某考古文化的主人强加在他们头上，他们当然不会提出抗议，特别是黄帝一类的象征性人物。模糊史学用在传说或神话时代，也许更符合历史实际。本书作者在一些类似问题上采取很谨严的态度，如涉及山东旧石器时代的遗存，指出这些远古的人类是否就是后来东夷人的远祖，尚待今后研究，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如作者指出东夷部落众多，分布范围宽广，夏商时期山东、苏北、淮北等地区的土著居民，才是历史上的真正的东夷人。后来，东夷人的文化日益受到中原文化的巨大影响而逐渐被融合，土著东夷人的范围越来越小。这些论点，平正扎实，均可成立。

关于东西方羌夷进退的问题，作者指出从已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资料来看，至少在这个时期东夷族人的文化不是自西向东发展，倒是自东向西发展的趋势非常明显。就是后来乃至商周时期，东夷人及其文化确有逐渐东移的趋势，也并不存在“被赶”的问题，那只是由于山东西部的东夷人在发达的中原文化的影响下，逐渐融合到中原华夏族中去的结果，是中原文化逐渐吸收和同化东方夷人文化的问题。东夷人的原始社会文化，并不比同时期的中原居民落后，在某些方面还处于领先地位。从距今约七千多年前的北辛文化起，中经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直到岳石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连续性；商周时期，东夷人的势力颇大，进入春秋以后东夷人逐渐被融合到齐鲁文化——华夏文化。一系列论点，从宏观的角度考察，有据有理，考古资料和文献典籍相结合，似已达于历史实际。

关于齐鲁两国建国情况，从齐鲁分封的差异——厚鲁薄齐和扶鲁抑齐，到两国建国方针的全面而系统的比较研究，联系发展历程以及思想文化的不同，新意层出，自成体系，显然可以提供在研究古国史时的方法上以新的启示。

总之，上面略举数例，以见一斑。甚望东夷新著出版，尽快澄清东夷历史上的迷雾。

代表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高峰——孔孟思想产生于齐鲁之邦，齐鲁建国于东夷故土，东夷历史源远流长，东夷研究当然成为历史学和考古学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但是，

“书缺有间”，古代史料很少，东夷历史上的许多问题，一时尚难作出定论，有待继续深入探讨。甚至可以说，许多问题正跨入起步阶段，不少问题尚未触及。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东夷古国史论》的问世，更为显出难能可贵了。

下面拟就东夷及其历史地位，略抒己见，以就正本书作者及读者。

(二)

“东夷”概念的形成，和其它历史事物一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运动变化的过程。

《尚书·禹贡》提到两河之间的冀州住有“鸟夷”（或作“岛夷”，误）；青州在海、泰之间，其中住有“嵎夷”、“莱夷”；青州南面到淮河的徐州住有“淮夷”；淮、海之间即自淮以南至海以东为扬州，也住有“鸟夷”（或作“岛夷”）；华阳、黑水为梁州，界域按郑康成说：自华山之南至于黑水，其中住有“和夷”。这里，一方面说明较晚成书的《禹贡》作者当时尚未形成“东夷”概念；另一方面说明当时

划州的界域是颇为粗线条的，并没有一个细致的确切的标帜。九州除核心地区外，边界线的弹性有时可能很大。《禹贡》作者关于华夏和夷人等的活动地区又提出“五服制”，王畿田土五百里为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为侯服，侯服外五百里为绥服，绥服外五百里为要服，要服之中三百里为夷，要服外五百里为荒服，荒服之中三百里为蛮。按照这个模式，以王国为中心向外辐射，距中心一千八百里为夷人，二千三百里为蛮人，似乎夷人较诸蛮人还要先进一些。

《国语·周语上》的“五服制”，和《尚书·禹贡》不同，大约有着根本性差异：“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这里并未规定距离里数，把夷蛮均放在要服之内，比《禹贡》增加了戎狄；同时笼统的模糊的勾划大体轮廓，可能更接近古代社会实际。

《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所列九州，和《禹贡》九州的名称、范围等均有所不同，各州也未提到居民的族属，只是概括的提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汉人或释九貉（貉）为九夷，数目字只能看作约数，当非确切数字。《尔雅·释地》又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属于同样情况。《后汉书·西南夷传》提到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看来，四夷、九夷、六夷等都是泛指约数。“职方氏”领掌“九服”，不是“五服”。“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按照这里的“九服制”，夷人又被放在蛮人之外的边区，距离王国

大为遥远，有四千里途程。

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已经慨叹“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各人构拟的先秦古史、黄帝其人事以及四夷活动地区、“五服制”或“九服制”等，肯定有主观倾向性或随意性，太史公对此特别强调应当“好学深思”和实地调查，“择其言尤雅者”加以论定。

上述三种“服”制，有一共同之点，就是在王国或王畿之外，东南西北均有夷人，并非只是东方才有夷人。这类把夷人、蛮人等分配在四方，而不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分配模式，在先秦或汉代学者著述中常有出现。如《左传》昭公十七年，孔子向郯子学习古代官制时，曾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这里的四夷包括东南西北戎狄夷蛮等许多少数民族，如像“诸侯”中包括公、侯、伯、子、男等称谓一样。我曾多次阐述对于古代民族社会历史的研究应当分清泛名与专名，自称和他称，解决东夷及其文化时，似乎仍然适用这一原则。

《公羊传·僖公四年》：陈国辕涛涂告诉齐桓公：“君既服南夷矣，何不还师滨海而东服东夷？”既有“东夷”，还有“南夷”，尚无“南蛮”。《论语》中亦未出现“东夷”、“南蛮”诸词。《孟子·梁惠王上》提到：“莅中国而抚四夷”，所指乃泛称四方少数民族。《孟子·尽心下》又提到：“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夷（或作狄，晚出）怨”正合“四夷”概念。《史记·燕召公世家》提到：“燕北迫蛮、貉”。《史记·匈奴传》又提到“北蛮”。“蛮”、“夷”词义均属他称泛名，并非某一单一民族的专称，即不是一个特定的民族学上的共同体。

司马迁撰写《史记》时，专门给西南地区横断山脉中许多

少数民族立传，称他们为“西南夷”，写了《西南夷列传》，还为匈奴、南越、东越、朝鲜、大宛立传；并未写《东夷传》。《汉书》有类似情况，增加西域，仍无《东夷传》。刘宋范曄编撰《后汉书》时，涉及许多少数民族，并列专传，其中有东夷、南蛮、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乌桓、鲜卑；东夷中有夫余、挹娄、高句丽、句丽（貊耳）、涉、韩（马韩、辰韩、弁韩）、倭。《三国志·魏书》写了乌丸（桓）、鲜卑、东夷。东夷中有夫余、高句丽、东沃沮、挹娄、涉、马韩、辰韩、弁韩、倭人。《蜀书》和《吴书》未立专传。《晋书》乃唐代初年编撰，除《载记》外，专立《四夷列传》，其中有东夷（夫余、马韩、辰韩、肃慎、倭人、裨离等十一国）、西夷（吐谷浑、焉耆、龟兹、大宛、康居、大秦）、南蛮（林邑、扶南）、北狄（匈奴）。唐代杜佑作《通典》，《边防》中列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时的“东夷”，范围越来越大，族属种姓名号越来越多，有朝鲜、涉（秽）、马韩、辰韩、弁韩、百济、新罗、倭、夫余、蝦夷、高句丽、东沃沮、挹娄、勿吉（靺鞨）、扶桑、女国、文身、大汉、琉球、闽越等约二十个邦国部落。

以上“夷”名，仍为泛称共名，显然不是某个单一民族的专名；它的范围在两三千年来不断扩大，它的内容越来越繁杂而“各有种性”。

将“东夷”作为词组并与“南蛮”、“西戎”、“北狄”并举同列，似首见于《礼记·曲礼下》：“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而且仅此一见。《礼记·王制》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

賁、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虽然《礼记》较《周礼》关于四夷的知识增加不少，但仍属粗线条的勾划，有一概括轮廓而已。《周礼·秋官司寇》中有：“罪隶，百有二十人”，郑玄注：“鬲，南蛮之别”；“夷隶，百有二十人”，郑玄注：夷隶为“征东夷所获”；“貉隶，百有二十人”，郑玄注：貉隶为“征东北夷所获。凡隶众矣，此其选以为役员，其余谓之隶民。”大约从战国晚期到汉代，已经将俘获的周边少数民族的一部份逐渐转化为官府劳作役隶，其余似为一般农作之人。此外，《周礼》中仅片言只字提及周边民族。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周礼》成书比《礼记》在时间上为早。

从上述“夷”人和“东夷”概念的形成出现，以至他们内含的变化（包括邦国部落、分布、种姓等），我们似应对东夷进行断代研究，根据具体时间和空间进行具体分析，并纳入一个母系统中探索，逐步接近历史实际。

（三）

春秋战国以来，华夏各国逐渐对东方的夷人社会生活历史有所了解。大体上记录出他们的邦国部落及其特色，同时逐渐增多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的来往交流。至于新石器时代山东地区各文化的主人因距夏商较近，把他们当作东方夷人族源之一，未尝不可，但仅系推理而已。在约两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氏族部落的兴亡以及移徙等情况，我们均未掌握直接的第一手材料。一时确难破解他们的奥秘。

《尚书·禹贡》冀州的鸟夷、皮服，郑玄注：鸟夷，东北

（或东方）之赋（应作搏）食鸟兽者。皮服，孔安国注：以皮为服。现代有些论著释鸟夷为以鸟为图腾，似有一定根据。唐代张守节作史记《正义》认为鸟夷和肃慎有关，并引《括地志》：“株鞞国，古肃慎也，在京东北万里以下，东及北各抵大海。其国南有白山，鸟兽草木皆白。其人处山林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至接九梯。养豕食肉，衣其皮。冬以猪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贵臭秽不洁，作厕于中，圜之而居。多勇力，善射。弓长四尺如弩，矢用柎，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葬则交木作椁，杀猪积椁上，富者至数百，贫者数十，以为死人之粮，以土上复之。以绳系于椁，头出土上，以酒灌爵，绳腐而止，无四时祭祀也。”这则描写社会习俗的文字，大多和《后汉书·东夷传·挹娄》相同。古代关于周边民族情况，大多得自传闻，很难亲身实地调查，加上地区接近，相互渗透，这类混同现象当可理解。养豕、衣皮、善射等风习，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诸泛称夷人的部落，大多为共同事物。夏商时期的豕韦似和他们有密切关系。《诗·商颂·长发》说：“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韦、顾、昆吾当为夏的联盟，且颇强大，商汤在攻伐夏王朝时先加以扫荡。韦即豕韦，原在河南滑县，顾在今山东范县，昆吾在今濮阳，三者地望相距不远。

豕韦源远流长，先在黄河中下游活动，后迁东北。《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范宣子说：“昔句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或写作失韦、室韦。确属古老的重要部落种姓。徐中舒教授考订涉（秒）、昧、株鞞，为其通称。他们又因所居地理不同，而有沃沮、勿吉、窝稽、挹娄诸称。《满州源流考》说挹娄与满语地噜声近，地噜即岩穴之义，挹娄为女真人

原住地，女真即满语的诸申，均为肃慎的不同译写。《金史》称金人先世出于靺鞨，清王朝当和他同源。契丹出自室韦。

《新唐书·室韦传》说：“河南有蒙瓦部”，蒙古亦当出自室韦。《左传》昭公九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北史·勿吉传》说：“勿吉一曰靺鞨，归肃慎国也。”《括地志》所写靺鞨的社会生活，和鸟夷有不少相似之处，可供参考。似有承袭渊源因素。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齐国原住居民：“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似乎他们均是以鸟名官的氏族部落。季荝、逢伯陵、蒲姑等大约是他们的首长首领，或演化成部落名。现在山东逢氏即出于逢伯陵氏。蒲姑，或作薄古，盘古、盘瓠、扶余均当是它的对音。《史记·周本纪》说周公“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奄即曲阜，又名龔中。《括地志》说：“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即淮夷也”。《左传》昭公九年詹桓伯说：“薄姑、商奄，吾东土也。”淮夷之中当以徐国最为强大。铜器“墜方鼎”铭文记周公“征伐东尸(夷)，丰白(伯)、薄古(蒲姑)咸戡(災)”。蒲姑灭亡后，部分余民逃往东北，称为扶余，统治涉人(豕韦之后)。《三国志·魏书·夫余传》记夫余：“国之耆老，自说古之亡人”。父老相传，保留下他们从山东去到东北的历史。交通路线当为越过渤海，进入辽东半岛，北去东北，南下朝鲜，这条交通路线从新石器时代即已开闢使用。

青州的嵎夷，或作郁夷、禺铁，唐代司马贞注禹夷在辽西，孔安国认为东表之地称嵎夷。《尚书·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暘谷或作汤谷，汤谷似为古文；古人多以为此乃日出之地，即东方极远之地。嵎夷宅居此地。《山

《海经》记黑齿国有汤谷，十日所出，和旧解东方远地意义符合。也许是山东半岛极东之地。或说禺夷为倭夷。青州还有“莱夷作牧。”孔安国注：“莱夷地名，可以作牧。”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引《汉书·地理志》：“东莱黄县有莱山”，《春秋》宣公九年：“齐侯伐莱”，服虔注：“东莱黄县是”，“作牧者，当以鸟兽为贡”，引《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四曰藪牧，养蕃鸟兽。”看来，莱夷在林藪之中狩猎畜牧为职责。

徐州的淮夷，金文或称南淮夷、淮夷、南夷，还有淮戎。郑玄注：“淮夷，淮水之上夷民也”。淮夷贡献蜃（玳瑁）珠及美鱼，仍为土特产。《史记·鲁世家》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逸周书·作雒》记：“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淮九邑。”淮夷嬴（盈）姓、徐、奄、秦、赵、邾等皆与淮夷同姓，楚王熊姓，秦楚均祖颡项，后世增殖裂变，姓氏有别。《诗·鲁颂·閟宫》：“泰山岩岩，鲁邦所詹（瞻），奄有龟蒙，逐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保有凫绎，逐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貉），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还夸耀成功：“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初东征是周人历史大事，东方许多原先附殷的夷人，基本上响应武庚和三叔，共起叛周，其中淮夷、群舒等盈、熊姓氏邦国部落都参加了。徐夷、淮夷与貉（貉）蛮相属，他们有较密切关系，或泛称为夷。貉人分布地区颇为广阔。群舒应为群徐，舒、徐二字为一根分化。春秋时有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等，均为偃姓，相传为皋陶后嗣，嬴、偃大概是一音之转。淮夷在西周春秋时屡见于史册，他的部落确实不少，从黄河下游、淮河流域到达长江北岸。徐偃王

的事迹虽然争论颇大，但应有相当素材，是可无疑的。

扬州有“鸟夷卉服，厥篚织贝。”孔安国注：“南海岛夷，草服葛越”。《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鸟夷：“东南之夷，善搏鸟者”，当为长子狩猎的氏族部落。“卉服”，供官府需用，贡献草服，如蓑草雨衣之类。更有可能是说此地夷人以草为服，编织贝壳作为服饰，如今台湾山地族人。

以上东方夷人，均《尚书》提及，分布地区是颇为宽阔的。

(四)

夷夏关系的史迹，大体上还可清理出一个线索。

根据《后汉书·东夷传》引《竹书纪年》，整理记录夷夏关系的简单大事表：

夏后相即位二年，征黄夷，七年，于夷来宾。“宾”即“宾服”，是一种松散的职贡关系。

夏后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先是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叛，自少康中兴后，世服王化，献其乐舞。

夏后泄二十一年，命猷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

暴君夏桀时，诸夷内侵。

商汤革夏命，伐定诸夷。

仲丁时，兰夷作乱，征之。自是夷人或服或叛，三百余年。

武乙时，政治衰败，东夷兴起，分别迁居淮水、泰山之间，渐居中土。

殷纣暴虐，尚武功，征伐东夷为败亡原因之一。

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磬柈苦矢。

成王初年，三叔及武庚叛乱，东方夷人部落参加者甚多。周初金文有“伐东夷”、“伐东国”、“静东国”史事。

周公东征，平定反叛夷人，包括南淮夷。

康王时，肃慎再来朝献。其后徐夷兴起，带领九夷攻伐宗周，西到黄河。

昭王南征不返，死于河水之中（舟复不救），可能荆舒等夷人也是南征对象之一。宗周钟铭文有“南夷，东夷具见廿又六邦”。

穆王时，不敢和徐夷征战，分给东方诸侯（主要当属夷人部落），由徐偃王统领。偃王的基地在潢池以东（李贤注：潢水至沛入泗，其地当在山阳以东，海陵以北一带），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当为保留较多原始社会民主色彩），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传说穆王后来命楚文王伐徐，偃王不忍心让人民在战争中死亡，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上万百姓跟随偃王，因名此山为徐山。李贤注武原县故城在今泗州下邳北面，徐山在其东。偃王故事争论未决，为千古悬案。

厉王无道，专营财力，暴虐，淮夷兴兵入寇，王命虢仲征伐，不克。

宣王即位，继续征讨，命召伯虎平定徐淮夷、徐方。

幽王淫乱，四夷交侵。

平王东迁，一段时间里，“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中原）不绝如缕（线）”。

齐桓公作为霸主，首先“尊王”、“攘夷”，召陵（在今河南偃城）之盟挫败荆楚，并“服东夷”，“观兵于东夷”。

春秋时期，江淮间徐夷（包括群舒）等小邦，先后成为齐、楚、吴争夺的对象，有时参预中原盟会，特别是楚国多次伐东夷，东侵，扩大领土到泗水流域，楚人势力达于今安徽全

境。

战国时期，兼并剧烈，各地交往频繁；到秦灭六国，淮泗之间的广大夷人成为编户齐民，逐渐同化了。

有夏一代，夷夏之间的关系值得很好研究。

《左传》襄公四年记晋国魏绛关于夏代夷夏之争的故事，比较翔实。《左传》哀公元年记伍员关于夷夏相互关系的史迹，又有所补充，可以相互印证。

夏后启作为当时天下“共主”，死后，子太康继位，兄弟五人，皆有昏德，史称太康失国，“五观”之乱。太康“盘游无度”，在洛水流域狩猎，“十旬弗返”。当时王朝内部传承问题、夷人和夏人关系问题都发生严重矛盾。夷人部落首领后羿“自钅迂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羿在古代是有名的射箭能手，《论语·宪问》说：“羿善射”；《孟子·离娄下》记：“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后羿是否为逢蒙所杀，尚待论定，但孟子所说羿为天下第一射手，似有所本。后羿养子寒浞因羿不修国政，嗜好田猎，又取代后羿的“共主”地位，正是因为夏人仅仅失去“共主”地位，所以能继续传承下去。《史记·夏本纪》记：“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弟少康立”。

“少康中兴”意味着恢复原有“共主”地位，史称“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这段历史既涉及夏人，又涉及夷人；从有关的地名可以考辨夏代夷人的分布地区与活动范围。但这些古地名究在今天何地，历来争论很大，也许还要继续探索下去。

或认为夏后启时，“益干启位，启杀之”，已反映夷人伯益（少昊后嗣）与夏后氏之间的尖锐斗争，从此开展东西方夷夏间长期的矛盾。

或认为夏人活动地区在黄河下游，《左传》所记夷夏之争的部落邦国地理范围基本不出黄河下游而多在山东，如有穷在今山东德县北，寒在今山东潍县东北，有鬲与有穷相近，斟灌在今山东寿光县东北，斟寻在今山东潍县西南，有仍在今山东济宁县，过在今山东掖县，戈在宋郑之间即今河南中部偏东，有虞和纶在今河南虞城。夏后氏的同姓国如观、莘、杞、郕、寒诸国和夏的联盟国一样，亦在东方，观在今山东观城县，莘在今山东曹县，杞本在今河南杞县，后一再迁徙到山东昌乐，古郕国有二，一姬，一姒，如郕在今山东峰县东，寒国据《归藏》卷二之二金文，当为姒姓，吴式芬引徐籀庄说即系寒姒之寒。杨向奎先生在上述论证之后判定夏在中叶以前的政治中心实在今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之间，而以山东为重点，与东夷交错相处，斗争融合；到了晚夏，政治中心西徙，到今河南巩、洛以至河东一带。

或认为太康兄弟五人，居于洛汭，羿射河伯，妻雒嫫，羿都亦在河洛之域，有夏之居，南望过于三涂，北瞻望于有河，有夏之居当在河南；并考定戈即斟灌，斟戈或作斟灌，过即斟寻，太康、羿、桀均曾居此，二地亦在河洛之域；故祖（祖）城在河南滑县；故寻城在河南巩县，河南有穷谷，盖本有穷氏所居，亦在河洛之域；有扈在今陕西鄠县；禹都在阳城（今河南登封）。按照以上论述，夏后氏或夏族兴于西方，不在东方。夷夏之争乃东西之争。

从历史和地理形势看，我认为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地区和冲积平原地区是可以分为东西二个大区的，大体上可用黄河中游和黄河下游（包括淮河下游）作为界划，在新石器时代基本上可算作两个文化圈，东部即后来形成的夷人文化圈，西部即后来形成的华夏文化圈，从夏代夷夏之争开始，二个文化圈逐